

习近平早期文选

从网上搜集的习近平在2003年之前的文章。

{{TOC}}

为官之道

习近平

《领导科学》1990年第9期

自古以来，为官之道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战国时的荀况说，执政者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有道也』。为官之道，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我以为重要的有四点：

一是为官之本。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偏激心理，认为清高者不屑于为官从政，不屑于与官为伍；认为官场多龌龊，为官多不廉。我想，这是混淆了『官』与『为官』的区别。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是社会的需要，并无好坏可言。但为官是有好坏之分的。因此，从做官的第一天起，就要思考为什么要当官和当什么官这两个问题。有些人致仕数十年，终为名利所困，或一事无成，或身败名裂。究其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当官宗旨。旧社会，有的人十年寒窗，潜心致仕是为了光宗耀祖，青史留名；有的人钻营官场，是为了鱼肉百姓，大发横财。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不过百十人而已。李白、杜甫官不过五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赵州桥的李春，也非大官；鲁班、黄道婆等更是与官无缘。可见，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如果当官只是为了图个人私利，那么，在政治上就会结党营私，行为上就会违背道德施欺骗邪恶之术，终难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的官的本质区别。造福于民要大公无私。只有无私才能无弊，无弊才能为政公平，使民安居乐业。造福于民，还要与民相知心，就是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主动、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为民办实事。

二是为官之理。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想当官又想发财是十分危险的。有些人当了官，就以权谋私，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古时候说『无官一身轻』，想当官又想享清福也是办不到的。当官要负责任，任务没有完成要找你，有困难要找你，出了事故要找你。我认为认认真真地当好共产党的官是很辛苦的。我也没有听到哪一个

称职的领导人说过当官真舒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要当官呢？从社会角度讲，官是一种职业，必须有人去做；从个人角度讲，当官是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一个不困私利，不困享乐，只图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在领导岗位上，即使工作苦些、累些，但他的心里是充实的，这种充实感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无穷的乐趣。

三是为官之德。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总会比一般人大。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斗不可。当领导要以德服人。道德榜样的影响力不能忽视，现代领导人应该更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上不成为榜样，就无法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

四是为官之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里讲的义，不是指江湖义气，而是指维护公正，申张道义。法是判别功过是非的客观标准。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维护公正，申张道义。北宋包拯认为：『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事事好人主义。好人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为官之义。没有为官之义会使法度变得模糊不清，纪纲变得松懈无力。事实证明，哪里的领导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哪里的正气就上升，事情就办好。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

习近平

《理论学习月刊》1991年第6·7期

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的组织基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都要通过基层组织来贯彻落实，离开基层组织，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署，只能是一纸空文，党政机关的工作。也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同时，基层党组织处在第一线，直接同群众打交道，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广大群众也是从基层组织来认识我们党的。基层党组织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形象。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应当成为整个党建工作的基础和重点。

怎样才能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有凝聚力、吸引力的坚强的战斗堡垒，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我深深地感到：当前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在诸多矛盾中，一些基层党组织班子软弱涣散、党员思想混乱、组织管理松懈是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下决心，花气力认真抓好班子建设，抓好党员教育和管理，并加强基层组织的制度建设。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搞好基层 Ze 建 Ze 工作的关键。只有加频班子建设，才能使广大党员有一个好的组织者、领头人，才能改变党组织软弱涣散状态，增强战斗力。福州郊区的洪山乡、黎明村、长乐的海星村，福清的宏路村，平潭的澳前村以及福日公司等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大量实践证明，一个单位能不能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组织有没有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一要坚决贯彻干部『四化』方针，配备好班子。选拔、任用干部要注重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品德、领导才能和工作实绩，防止片面强调年龄和文凭，防止重才轻德。对于那些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的专业技术干部，要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让他们归队，发挥所长。对那些素质差，个人主义严重，长期闹不团结的干部，经教育仍不改的，要坚决调整。二要特别注意选好党委和党支部的书记。因为『班长』在些个班子中起着主导作用，在选配『班长』时，更要慎重准确。『班长』不仅要有组织领导能力，善于团结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敢于坚持原则。

二、党员教育和管理，是基层 Ze 建 Ze 工作的根本。只有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才能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才能增强党员队伍的素质，才能把众多党员组织成为有统一意志和战斗力的战斗集体。因此，加强党员教育和管理是当前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基层党组织在抓党员教育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总的说，党员教育和管理还很不得力，有的还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心须在『深』字和『严』字上下功夫。

在党员教育上要抓一个『深』字。要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党员教育的任务，改变过去一些基层组织存在的念念报纸、读读文件、党员教育表面化的现象，把提高全体党员的内在素质放在突出位置，作为主要目标。首先，要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每个党员自觉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次，要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素质和思想觉悟；第三，要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使每个党员都牢记党的

纲领和宗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严格用党员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第四，要进行反腐蚀、反渗透、反颠覆、反演变的教育，特别是在沿海一线更要这样做，使全体党员牢固树立敌情观念、阶级斗争观念，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反腐蚀、反渗透、反颠覆、反演变的『钢铁长城』，经受改革开放的考验。同时，要深层次地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要从关心、爱护党员出发，采取启发和民主讨论等方法，激发党员的内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使党员教育深入人心，牢牢扎根。

在党员管理方面要抓一个『严』字。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几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措施：一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坚持『三会一课』，推广共产党同参加党维织生活会记录卡等制度，保证党员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二是坚持和完善党员目标管理，健全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三是强化监督机制，严格党内监督，既要提倡党员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又要加强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四是严明党纪，严肃政治纪律，强调党员必须维护党和政府号令的严肃性，自觉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严。对那些贪污受贿、敲诈勒索、道德败坏、政治品德恶劣等腐败分子，要坚决清除出党，对严重的违纪行为，必须按党章规定，严肃处理。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是搞好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保证。我市许多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经验证明，只有抓好制度建设，才能强化党内监督机制，使基层党建工作逐步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近几年来，我市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普遍建立健全了『三会一课』、党员目标责任制、党员责任区、党员活动日、民主评议党员、组织生活会记录卡等制度，对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起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有的制度缺乏针对性，要求太高，与现阶段党员的思想水平相差较大，实践中难以执行；有的失之过宽，达不到从严治党的要求；有的好制度没有认真执行，仅仅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一纸空文，等等。今后制度建设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突出一个『实』字。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使各项规章制度既符合党章、准则的精神，又切实可行。对已建立的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要认真进行回顾总结，该修订的修订，该充实提高的充实提高，对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坚持下去，狠抓落实，说到做到，令行禁止。上级党委要加强对所属基层组织执行制度的督促检查工作，帮助基层组织落实各项制度建设的措施，使基层党建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方面迈出更大步伐。

(作者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加强地方立法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习近平

《人民政坛》1994年S1期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具体地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新的形势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进一步增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提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自觉性，要把地方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摆在首位，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更好地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

一、充分认识地方立法的重要意义。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立法体系有两个层次，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这是国家最高立法；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城市的地方立法。地方立法是宪法关于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原则的体现，是根据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所决定的。国家立法对全国重大的普遍适用的问题作出规范，具有普遍性。而地方立法是针对自己的实际需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对国家法律的延伸和细化，具有特殊性。相对于国

家立法，地方立法可以更充分、更直接地反映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对法制建设的要求，因地制宜地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的最基本特点和优势。同时，地方立法是对国家立法的必要补充。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因此，加强地方立法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共同促进立法工作的加快进行。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应当发挥其积极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地方立法步伐。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在本届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因此，我们要把握形势，把加强地方立法作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努力工作，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和本地区特点的地方性法规体系。要使地方立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就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确定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立法的新思路。在地方立法工作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脑筋、拓宽视野、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就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立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看准了，可以大胆去试验。福州市制定的《福州市保护城市中学、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若干规定》和《福州市保税区条例》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国家教委还向全国各地批转了《福州市保护城市中学、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若干规定》。对于地方经济立法不要求全责备，有些法规可以先制定，然后在执行中不断完善，在实践中进行补充和修改。《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是1986年颁布实施的，由于该《条例》受历史的局限，在发展范围、土地使用、劳动管理等许多方面都与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我们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在反复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方案，新《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于1993年10月颁布实施。

三、地方立法工作要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们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来调整和规范。因此，我们应对立法工作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和宏观上的规划。正确处理好急与缓、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使地方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从而减少或避免盲目性。福州市人大常委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15个地方性法规，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实施的有13项。特别是1993年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一年来共制定了5项法规。但所制定的法规基本上是按部门、行业的急需立法的项目多，紧紧围绕市场经济主体和行为进行立法还不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快地方经济立法步伐，我们应当把立法工作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预测和规划，从宏观上把握地方立法的趋势和发展。加强立法工作的计划性，有利于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有利于各有关方面在制定法规前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有利于把长远的安排与当前的迫切需要结合起来，以发挥地方立法的及时性和导向性作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调查研究，努力尽快地制定出福州市今后五年的立法规划，以适应在新形势下，对经济立法提出超前性的要求。当然，立法规划和计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就要及时地对立法规划和计划进行调整。

我们在加快地方立法的同时，要注意执法的质量，这就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执法的监督检查，使所制定的法规真正付诸实施。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

习近平

《红旗文稿》1998年11期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深入观察就可发现，我们只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机制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而在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仍处于探索之中。因此，为顺利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目标，很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在辩证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在探索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论。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至今存在多种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无关论』或『不相容论』，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相容的。二是『相关论』或『相容论』，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相关相容的，二者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联系的程度以及主次位置有所不同。如有的同志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用市场经济这个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是基础，市场经济是建立其上的设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这两个不同事物的结合。

从根本上揭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联系的，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论断。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飞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已为俄国、中国等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所证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必然是相容的。

我们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容的，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特别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与社会主义相矛盾的地方比与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地方要更多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这种相伴而生的密切关系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一定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与商品生产规律的关系时指出：『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的论述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

前提的，而劳动力商品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并在流通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商品生产规律的应用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产生。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市场经济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运行机制或管理体制，而是一种具有两种功能的东西：它既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管理体制依附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为之服务。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得是如此巧妙和浑然一体，就必然会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一系列不和谐的矛盾，并使得一些人由此而认定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地方，这种不和谐同样要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自主经营、追逐利润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显著优点，能够较快较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这些弱点必然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并将引发一些新的矛盾，诸如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投机性会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

原则产生矛盾，市场的竞争性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体制，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融为一体。而要实现这种有机融合，必须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而不懈奋斗，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对市场经济也应持同样态度，不能将其优长与弊端不加区别地搞『一锅烩』，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并将其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之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出巨大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防止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的倾向，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由于受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善于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问题，有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迈不开步子；有的则只记住了市场经济，忘记了社会主义，出现了重市场经济、轻社会主义的偏向；还有的习惯于『一手抓』，顾此失彼，忙于『抓一头』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及时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强劲的势头。

三是要纠正和防止新旧体制『劣势组合』的偏向，使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得以顺利实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还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即把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些对部门和单位的利益有着利害关系的东西，例如管理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便利等等保留下来，并与市场经济中那些便于扩大部门和单位利益的消极因素结合起来，致使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形失真。这种由两种经济体制的弊端形成的劣势组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及时纠正和防止新旧体制『劣势组合』的偏向，不仅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要坚决摒弃，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消极因素也要及时予以消除，并努力将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优长与市场经济体制合理配置资源、由价值规律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等优长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经济与政治是现代社会中两个紧密联系着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会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是一种既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又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常被扭曲，有时被硬性分离，有时被一个方面取代另一个方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有利于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但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这种统一，只能为之提供一种好的发展形式。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实现政治和经济有机统一的因素。在政治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和习惯影响，仍在妨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一些消极因素，也在对社会主义政治产生着负面影响。例如，市场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盲目追逐，会对执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等等。而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仅仅单方面地依靠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自身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帮助对方抑制和消除所存在的不和谐因

素。从近几年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优势，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环节：

一是要善于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例如，当前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效益不好等问题，有不少是决策者的素质和组织上用人不当造成的。这两类问题虽然属于政治范畴，但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不仅不能将人的主观因素方面的问题归咎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还要看到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那种一见问题具有政治因素，就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不好那不好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同样，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市场混乱、无序竞争、经营欺诈等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而对此持否定态度。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那种一遇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就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上找『茬子』的做法，是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二是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深入认识、发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经济优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势忘却了，特别是对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忘却的人更多一些。例如，在企业改革中，许多企业领导人只记住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和经济奖惩手段，忘记了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自己摆在与群众相对立的位置，结果使企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其实，社会主义的这些政治优势，对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实践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来看，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一大突出优势，但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能优化配置自然资源，同样也能够优化配置政治资源，这一点却恰恰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由此可见，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还必须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发掘这些优势，这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要善于通过换位思考去充分认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是，搞经济的多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搞政治的则多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政治问题，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的工作都不了解，发现不了对方的优势，甚至对一个涉及双方的共同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更难以将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例如，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先进的经营方式，但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只从经济角度来认识和运用这一方式，而不少政工干部对这一经营方式又不甚了解，因而有些人在对外合资中只看到了钱和物--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没有看到企业还有一些既不属于流动资本、又不属于固定资本的无形资产，诸如企业的驰名商标、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验等等；有些人虽然看到了这些无形资产，也进行了资产评估，但对同属于企业无形资产的长期形成的优良精神、坚强的企业党组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无形政治资产，却很少看得见、想得到，从而造成了企业无形资产的大量流失。所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经济工作者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认识经济问题，还必须善于从政治角度来观察经济问题。同时，也要求广大政治工作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从政治角度观察政治问题的同时，善于从经济角度来观察政治问题。这不是对他们的苛求，而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对他们提出的必然的也是基本的客观要求。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